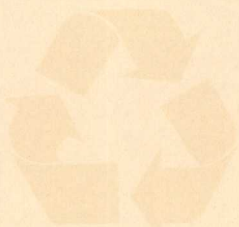


百家文丛



法律制度供给与
“三农”问题治理

FALV ZHIDU GONGGEI YU
SANNONG WENTI ZHILI

王少杰 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法律制度供给与“三农”问题治理 / 王少杰著.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5. 12
(百家文丛)

ISBN 7-5034-1754-4

I. 法… II. 王… III. ①农业经济—研究—中国
②农村经济—研究—中国 ③农民—问题—研究—中国
IV. ①F32 ②D422.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44339 号

责任编辑: 李春华

封面设计: 孟祥成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太平桥大街 23 号 100811

印刷装订: 北京忠信诚胶印厂 邮编: 101109

经 销: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 本: 850mm×1168mm 1/32

印 张: 6.5

字 数: 155 千字

版 次: 2005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0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7-5034-1754-4/G·0366

全套定价: 180.00 元

文史版图书如有印、装错误, 工厂负责退换。

目 录

目 录

第一章 导 论	1
一、农民问题不是农民的问题	1
二、农业问题不是农业的问题	17
三、农村问题不是农村的问题	21
四、小结	24
第二章 中国“三农”问题形成原因考	25
一、目前关于“三农”问题形成研究的现状及其缺陷	25
二、中国“三农”问题的形成原因	27
三、结束语	36
第三章 关于“三农”问题本质的再认识	38
一、经济本质论	38
二、政治本质论	40
三、社会本质论	41
四、法律本质论	42
第四章 宪政制度供给与“三农”问题治理	46
一、“三农”问题形成的宪政原因	47
二、宪政对解决“三农”问题的意义	50
三、解决“三农”问题的宪政之路	51
四、结束语	63
第五章 人力产权·人力资本与中国农村人力资源开发	65

法律制度供给与“三农”问题治理

一、目前理论界关于农村人力资源开发问题研究 的现状及缺陷	66
二、构建人力产权法律制度	69
三、人力产权还是人力资本:中国农村人力资源 开发中的抉择	80
四、以人力产权理论为指导构建中国农村人力 资源开发法律制度,为农村可持续经济增长 模式的实现提供制度支持	83
五、结束语	88
第六章 中国农村治理模式的重构	91
一、中国农村治理结构历史考	92
二、理论界关于农村治理结构研究的现状	104
三、目前理论界关于农村治理结构研究的缺陷	107
四、中国农村新型治理结构的构建	110
五、结束语	121
第七章 关于农民教育权利的保护	123
一、农民受教育权利的保护	124
二、通过农村教育投资体制的变革确保农民的 义务教育权	131
第八章 中国农业知识产权保护问题	139
一、农业知识产权的保护内容	140
二、加强农业知识产权保护的意义	141
三、我国农业知识产权保护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143
四、推进我国农业知识产权保护的途径	145
第九章 开展“三农”问题宏观立法,促进治理“三农”问题 工作方式的转变	152
一、为何制订“三农”问题促进法	152

目 录

二、制订“三农”问题促进法的意义	154
三、“三农”问题促进法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的地位	156
四、“三农”问题促进法的基本框架构想	157
五、结语	160
第十章 SA8000 中国化与农民工权益的保护	161
一、SA8000 的产生背景	162
二、SA8000 的主要内容	162
三、SA8000 认证的基本特点及概况	164
四、SA8000 中国化的困惑	165
五、SA8000 中国化对我国的好处	166
六、SA8000 的中国化与中国农民工权益保护的 对策性思考	168
第十一章 中国农村土地制度问题	171
一、农地制度变革的几个问题	171
二、中国农地制度变革中的神话	179
三、城市化、工业化过程中农民土地权利的保护问题	189

第一章 导 论

一、农民问题不是农民的问题

(一) 引言

公元2005年6月20日是中国现代化史上值得纪念的一个“特殊日子”，学术界应该对此事进行大书、特书地研究一翻。这一天对于我正在从事的研究工作来说，更是一个意义极其重大的日子，在论述“农民问题不是农民的问题”这一问题前，我把从网上下载的新闻报道单列出来，期望大家能对这现代版的“多收三五斗”有个全面了解，并有助于对本章内容的理解。

南京限制农用运瓜车进城，瓜农含泪抛售

<http://news.163.com> 2005-06-22 08:11:22

2005年6月20日起，南京禁止农用运瓜车进城，当晚，近40辆运瓜车被堵在南京长江大桥北关卡过不了江，从大桥上过来的瓜车都被拦下，瓜农个个一脸期盼。

追踪索引

昨天是南京执行运瓜车进城新规第二天，大量运瓜拖拉机、三轮车被挡在城外。为了能够早点进城，一些瓜农只得高价租用中巴、面的或厢式货车，重新装运起西瓜。而更多瓜农不得不含泪“打道回府”或将西瓜卖给瓜贩，或就地低价销售。与此同时，南京市区西瓜零售价继续上扬，城内城外价格相差三四角钱。一些市民瓜农开始质疑新规：“渣土车能在南京城内横冲直撞，为何运瓜的拖拉机三轮车就不能进城？”

数百辆运瓜车被挡

昨天0点左右，南京长江大桥浦珠路入桥口被瓜农运瓜的拖拉机三轮车堵住，造成该路段交通接近瘫痪1个多小时，大桥由南向北通行车辆大量积压，排队达数公里之长。记者赶到现场时，看到浦珠路入桥口处，停了100多辆拖拉机和农用三轮机动车，以至其它上桥车辆无法通行。当天准备进南京城卖瓜的瓜农大多来苏北和安徽一些地区，有些瓜农流下了伤心的眼泪。安徽全椒的瓜农李定胜是开拖拉机来南京的，车上装了1500斤西瓜。“早晨5、6点就从家出发，一直到下午5点多才到这里，谁知道一来就让交警拦下，说拖拉机不让进城。到现在，我连一口饭都没赶上吃。这些瓜如果不尽快卖掉，摆个三五天就会全坏，到时候，只能扔进长江里。”李定胜说着流下了眼泪。他已在大桥边耗了7个小时。据介绍，当天从安徽来南京卖瓜的有50多辆，全是拖拉机和农用三轮机动车。“此前，我们并不知道南京从6月20日开始不让拖拉机和农用三轮机动车进城，我们是被交警拦下来后才得知这一规定的。”深夜0点30分，在交警的劝说和疏导下，一些瓜农开

第一章

动各自的拖拉机和三轮农用车，从浦珠路大桥下的环道返回。近1时，浦珠路上桥口的积压车辆全部驶离该路段，长江大桥恢复畅通。

瓜农无奈抛售西瓜

昨天中午12点半左右，记者再次来到了大桥以北。由于大量运送西瓜的三轮车和拖拉机进不了城，造成泰山新村一带到处都是卖瓜的瓜农。“5毛钱一斤，要多少？还可以再便宜一点的。”瓜农们为了尽早卖掉西瓜，不得不低价抛售。不少瓜贩也趁机压价，开出的价格更是低至每斤只有3毛5分钱。平均按照一车瓜1500斤计算，被挡在大桥北路的每个瓜农这一趟至少收入450元左右。在珠浦路西侧，来自安徽滁州的瓜农小童正在招揽几个路过的顾客买瓜。他说：“我家种了2亩瓜地，昨晚10点从滁州出发，凌晨5点到的桥北，觉都没捞着睡。如果能进城，一斤西瓜能卖到八九毛，现在只能卖到五六毛，买的人还少。”，下午3点，南京长江大桥引桥桥洞下，热浪滚滚，安徽全椒的瓜农李全财坐在地上，脸上满是疲惫，衣服早已被汗水浸透。“前晚7点就来了，结果没有能过大桥，只好在这里卖了。”望着拖拉机上的大半车西瓜，李全财眼神里写满了无奈，“5毛钱一斤，到现在连三分之一都还没有卖掉。来回颠簸，加上天气这么热，瓜都被晒软了，更不好卖。”李全财告诉记者，家里种了5亩西瓜，孩子的学费、家里平日开销等费用。“一家人都眼巴巴地看着地里的西瓜，今年西瓜丰收，本来想到南京卖个好价钱，没想到却是这种状况。”

瓜贩压价收购西瓜

在长江大桥北被挡在关卡外的长长的运瓜拖拉机中，记者

发现活跃着一些瓜贩，他们不停地和瓜农交谈着，讨价还价，特别活跃。和他们成交的大多是南京以外赶来的瓜农。安徽明光的瓜农王文武这次用拖拉机拉了近2000斤瓜来南京，一路颠簸7个多小时，他和妻子已是疲惫不堪。“这么热的天，再拉回去，瓜肯定不新鲜，也很难卖上价。只好忍痛卖给瓜贩，一斤瓜四毛钱。”安徽滁州的瓜农刘海山告诉记者：“我家里种了将近5亩的西瓜，这趟用拖拉机拉了2000斤的瓜，准备进南京城卖。用拖拉机运输主要是为了节省开支，前段时间也有南京的瓜贩子到我们那里收瓜。其实，我们把瓜卖给瓜贩子，得的钱只是我们自己进城卖得的钱的三分之一，三分之二利润被瓜贩赚走。我们当然情愿自己进城卖，这样可以多赚点。我们进城卖的价格也比瓜贩子便宜，这样南京的市民能买到便宜的瓜，得到实惠，我们也能多赚点钱。”刘海山面泛难色地说：“这车2000斤能买1000多块钱，本来打算进南京把家里的瓜卖完，除去种瓜的成本和需要缴的费用，赚的钱给家里两个上小学的孩子缴学费，学费两个人加起来就要1000多块钱，余下的贴补家用。现在看来，难了……”

出租货车生意火爆

在江北泰山新村一带，记者发现有不少空三轮车和拖拉机，车上连一个西瓜都没有。“哪里是卖掉了，我们几家合伙租了辆货车，把西瓜拖到城里去卖了。我在这里看车等他们。”安徽来安的瓜农李玉英说，前晚10点左右就和同村的5个瓜农到南京，以为半夜里拖拉机能从长江大桥通过。“不给进城，又不能拉回去，这么远的路拉过来，要是只卖四、五毛钱一斤，实在太亏了。”李玉英等人商量来、商量去，最后只好咬牙花了350块钱租了辆货车进城。“这两天生意不错，主要都是瓜农租车进

第一章

城的。”货车司机赵师傅笑呵呵地说，“大半天就跑了4、5趟，都是替瓜农拉西瓜的，一趟最低200块。”据了解，农用车禁止从长江大桥通行，泰山新村一带租车生意火爆，甚至连“黑面的”都加入了“运瓜大军”。“瓜农的农用车不能走长江大桥，想进城肯定得租车，有些瓜贩子也来租车。”一位面的司机告诉记者，由于运瓜有不少赚头，他干脆就把面的后排座位卸下来，专门为瓜农运送西瓜进城。

市区瓜价明显上涨

由于禁止三轮车和拖拉机进城，受此影响，南京市区的瓜价一斤平均上涨了0.1元，普通西瓜最高已卖到0.8元一斤。“主要是西瓜进城成本提高。由于增加了运费费用，瓜的价钱就比以往贵了1角钱，每斤西瓜从以前的7角钱到卖到了现在的8角钱。”昨天下午，瓜农朱海说。他在四条巷附近卖瓜已近半个月，由于进城难，他不得不租了一辆面包车，每晚3点多从江宁把瓜拉过来，每拉一次瓜要给车主100多块钱，每次拉1200斤左右的西瓜。朱海还告诉记者，现在不比从前了，以前卖瓜不用偷偷摸摸的，现在卖瓜不仅要掏运费还要偷偷摸摸的，晚上运瓜的时候如果被抓到还要交罚款。“我很想不通，城里的人想吃我们瓜农种的瓜，而我们也想把瓜买卖到城里来，为什么不让我们进城卖瓜呢？我们种瓜也不容易，难道让瓜烂在地里吗？我们夏天就指望卖瓜挣点钱了，现在还不让我们进城，这不是让我们的日子更难过吗”。在东白菜园卖瓜的李女士也告诉记者，由于进不了城，只好在前晚租了一辆货车拉了2000斤的西瓜来卖。以前每斤瓜买5角钱一斤，现在卖6角钱一斤，因为2000斤西瓜的运费就要140元钱。

读者为瓜农而落泪

本该昨日 9:30 开通的热线，在 8 点多就有很多热心读者开始打进。教书育人的胡女士是第一个拨通电话的，她情绪显得很激动，并表示绝对支持这些瓜农，胡女士告诉记者，她看了报道之后甚至对丈夫说，真想把“支持瓜农”四个字写在衣服上面。曾在澳洲待过较长一段时间的石先生说，在国外是不可能出现类似这样的禁令，为何管理者们在制定措施的时候就不能够体现出一种人性化的管理方式呢？市容等部门完全可以通过收取瓜农适当的费用、规定在某段时间进城、采用四轮车拖运西瓜来尽量减少污染噪音，等等这些方法都是可行的，为什么总是一纸禁令，城市管理明显缺乏灵活度，管理的根本在于疏而不是堵。身为公务员的袁先生表示自己是农民的儿子，深知农民的辛苦、艰辛和不容易。政府应当为民着想，扶植农民致富，想尽一切办法帮助农民将西瓜全部卖出去，而不至于因为没能及时卖全部坏掉。袁先生表示，今年西瓜是个好收成，但瓜农却不能卖出个好价钱，问题症结在哪儿？他反复地重复着一句话：“官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一个在退休干部张女士在热线中就哭了，她说，她为瓜农的遭遇感到难过，“本就指望一年中这一季有个好收入来养家糊口，这个规定瓜农又能获利多少呢？”在热线中，记者意外的接到了一位渣土车司机的电话，他简单的说了一句：“其实更应该好好管管我们渣土车，瓜农的运输车进城后比我们老实多了。”

政府出发点是为了文明城市

据悉，今年南京的瓜车进城新规主要是为了服从创建文明城市的需要。有关人士表示，农民运输瓜果的拖拉机和三

第一章

轮机动车车况较差，不但影响交通，还存在安全隐患，而且一般都是夜里进城，噪音也容易扰民。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南京决定对拖拉机和三轮机动车全天候禁行。不过，对运送瓜果的四轮机动车和货运汽车仍网开一面，可以在规定时间和区域内通行。

看完上面的故事，我想每一个有良知的人都会为农民的恶劣社会生存环境而愤怒，而对于每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来说，都不会反对“农民问题不是农民的问题”这一命题。淮海战役的炮声犹在国人的耳边萦绕，陈毅元帅的名言：淮海战役是农民用手推车推出来的。这句话对于每一位接受过初等教育的人来说都不陌生。但是当江山人民坐的时候，比手推车先进了数个世纪的农用车却不能进城门了，人民政府为了一次行政性的检查达标、评先进而把农民的利益视为粪土。毛主席曾经“粪土当年万户侯”，这是革命浪漫主义激情的表现，而我们今天的人民政府却是“粪土当今九亿农”，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激情？我本人无法体会，但我深深体会到我们处在一个健忘的时代，我们遗忘了历史的缔造者，我们会因为他们的一些为了生计而做出的错误行为而对他们耿耿于怀，甚至是歇斯底里的诅骂。

有人曾发出慨叹：中国人很勤劳但为何不能富裕？中国人每天忙碌却过着贫困的日子，这是什么原因导致得呢？发问的人到底没能找到正确的答案，但我们读了上面的故事，答案就了然于胸了。当人民处在公民权利无法保障的时代，他们就是累死在工作岗位上，又能怎样？他们的劳动成果是为特权者准备的茶余饭后的“点心”而已，只要特权者高兴、喜欢，天下就是他们家的花园，大手指在那，农家小屋就哗哗地倒下一片，美丽的“空中花园”就会迅速地掘起；只要特权者吹毛求疵，人

民的劳动成果即化为他们囊中之物，人民就将一无所有；只要特权者写几个字，人民就得画地为牢而不能挪动，否则以违法论处。政府给每位百姓身体中植入“紧箍基因”，从而使百姓成为特权者随心所欲操控的“木偶”，木偶能有什么？什么都没有。

今天，当我们为农民的处境大声疾呼时，我们却忽视了农民的权利基因，正是由于权利基因的变异，农民才沦为社会演进的铺路石子，当政者们才可以把农民视为他们私家农场中的奶牛，随时找个借口来吮吸自己所需的“营养”，从而使农民在几千年来的历史演进中始终处于死亡的边缘。今天，我们需要重新来认识农民问题，反思农民问题，搞清楚谁才是农民贫困化的罪魁祸首。

中国农民问题是中国历史演进的核心问题，古代、近代如此。今天也盖莫能外。然而我们关于农民问题的认识，却一直停留在问题的表面，而在很大的范围内，人们往往把农民问题迁怒于农民自身：认为农民自身的文化素质低下，导致其无法找到好的工作从而来改变自己的处境；农民的功利观念使其带有根深蒂固的狭隘性和保守性，对公共管理和对自身利益无直接关系的事情总是持冷漠的态度，从而造成农民因循守旧的本性，进而使其不易接受变革；农民安贫乐道的心理导致农民自我约束了自身的创造力，从而形成求稳不求变，求同不求异，对待新事物和新观念和外来文化持怀疑和排斥的态度；此外农民还具有自我封闭观念，轻视竞争等观念，^[1]这一切特有的属性导致农民在现代化的征途上赶得很累，但仍然处于落后的境况。中国农民为何处于这样的境况？难道世界上存在天生的农民吗？难道从“农妇”胎里掉下来的“人”先天不足吗？有些人显然会从不同的侧面“yes”这样的问题，但这正反映了我们对农民的歧视，而正是这种歧视才导致中国农民今天的处境。当

第一章

然这种歧视是以历代政府从国家层面上的歧视为主流，而民间的歧视风潮则不足为怪，毕竟嫌贫爱富是人的一大缺陷性特征。即使在社会主义国家也是如此，否则怎么会频繁出现富人光天化日之下侵犯穷人的事件不断发生呢？

（二）历史的罪恶

在罪恶的“重农抑商”时代，国家通过“编户齐民”等政策把农民牢牢地固定在土地上，而且再辅之于诸多微观管理制度的构建，从而把农民穿在一条权力主线上。失去自由发展空间的农民只能世代生活在土地上，别无选择地接受了国家的残酷剥削，频繁的农民战争并没有帮助农民找到幸福的“乐土”，反而使战争中获利的新贵们加重对农民的剥削，越往后这种情况越普遍。所以中国古代“重农”的真正目的在于“愚民”，把农民变为忠顺的“羔羊”，把农民与土地紧紧捆绑在一起，最终斩断农民从事其他行业的道路，这样农民生活在苦难中就不足为奇了。

近代以来，尽管我们引进了西方的一些政治、法律等方面的制度，但是有关被引进制度的“灵魂”却在中国难以找到可依托的“肉体”，从而造成被喻为现代文明代表的西方民主制度在中国只能沦为“孤魂”、“野鬼”。即使是规模宏大的太平天国运动，也只不过是一场沾满皇权意识的东方农民悲剧，始终没有找到一条保护农民权利的道路；搅乱中国当时官场秩序的维新变法运动，并没有形成一种普世意义上的大众的民权保护思路，最终只能百日而亡，中国最大多数人口——农民的权益保护却没有进入维新者的视野；在军阀共和时代，事实上是一种皇权阴影下的共和，农民仍然是皇权意义上的“子民”，现代公民意义上的农民概念并没有进入统治者的治国思维；对于在孙文建国思想指导下走上中国政治舞台的民国政府来说，占人口

绝大多数的农民群体仍然没有进入施政者的视野，在国家现代化的蓝图中，农民所占的位置则是微乎其微，对农民而言，三民主义充其量只能是“三名主义”，即三个名词的主义；当马克思主义在 20 世纪上半叶传入中国后，中国农民终于找到了自己的组织，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农民告别了“冷兵器”而代之以洋枪从而在战场上找到了自己的真正价值和应有政治地位，并且因此而得到了自己梦寐以求的小块土地。在这次战争中，农民由于第一次拥有了一个现代政党组织来领导从而在中国农民战争史上第一次有了自己明确的政治诉求和目标，中国共产党也因为充分发掘了这股长期潜伏在民间的力量而获取了政权。然而在这场新式的农民战争中，因为领导它的政党是用洋理论武装起来的政党，从而使这场战争中的事实主力军被人为地变为工人阶级的同盟军，也正是这次历史性的错误定位，使中国农民通过抛头颅、洒热血、伏尸百万、流血千里而换来的政治地位在以后的历史实践中被再次错误改写，导致农民所获取的权利只能是昙花一现。

在中国全面开展国家建设的现代、当代史上，农民在土地革命时期用生命积累下来的政治资本在和平建设年代逐步丧失，这种状况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农民财产权利的丧失，另一个方面是迁移自由权利的丧失。财产权利的丧失使农民重新变为赤贫的群体，这种情况是国家通过合法的途径实现的，即法律赋予了国家剥夺农民财产权利的权力。这一法律行为直接导致农民由一个独立的群体再次演变为国家的附庸，即把农民直接“嵌入”国家这个大共同体中，彻底消灭了民间小共同体存在的条件，这对于消灭小私有制来说无异于是一次釜底抽薪、斩草除根的措施，这同样也是人类历史上消灭小私有制的“经典之作”。在这种状况下，农民只能集体失语，通过失

第一章

语来最大限度保护其在社会大博弈中的微薄利益，而这种利益就是确保其在国家现代化大道上能成为一颗光荣的石子，而不至于被现代化的列车压碎。也就是说在整个国家现代化的起步阶段，农民成为一颗只讲奉献而永不发光的“螺丝钉”。因为自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经典社会主义理论家确立起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以来，我们无法找到他们从政治上、法律上对农民保护的系统言论，在他们的理论视野中，农民永远是落后的、愚昧的、自私的、散漫的、代表低下生产力的一个由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武装起来的先进的政治集团既离不开又见不得的特殊群体。因为他们有太多的事而他们的这些事足以拖跨革命者的神圣、伟大的事业。正是经典理论上对农民的这种类“种族歧视”导致农民在现代化征程上缺位。我们当初的现代化设计蓝图对这个特殊群体的关注是极其有限，仅有的关注表现在对他们劳动成果的合法剥夺上，以便彻底消灭他们头脑中的小私有观念，把他们改造为社会主义的新人，以便使他们能完全服从国家的大计，使我们的现代化蓝图能变的更美好。这种状况造成农民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私人劳动变为公共劳动，如此状况农民问题能不凸现吗？有谁愿意把自己的劳动成果拱手让与别人而自己过非人的生活？

（三）现实的悲哀

这样一种不正常的产权观念和产权制度成为农民改革的“导火索”，农民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来收回自己的产权，从而打破了农村沉寂的局面，点燃了中国改革的火炬，再一次挽救了中国。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中国农民过上了有史以来综合质量最高的生活，但这样的太平日子很快被政府的行为打乱。各种各样的税收、摊派、提留、罚款等等的要钱行为如同洪水

般地涌向农村，一时间广阔的农村变为基层政府官员们挖空心思逐利的主战场，改革初期积聚起来的微薄财富再次被政府和官员们洗劫一空，而且这种洗劫随着时间的推移是变本加厉的。特别是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开始，农民是在超负荷的环境下生活，贫困因“和平的暴政”而再次向农民袭来，农民想求发展的道路被恶劣的官吏堵死，大量的农民在农村求富无门的情况下，只好冒着风险涌向城市，而这一贫困人口的涌动过程又成就了城市里一代“大盖帽”的暴富梦，也让那些虐待狂们过够了残酷虐待弱势群体的瘾，遍体鳞伤的农民在自己曾经用生命换来的乐土上无法找到快乐的生活。我们别忘了中国农民是世界上最勤劳、最能忍受官吏压迫、最善良的一个独特群体，关于这一点，我们看看有关国内农民状况的报道就一目了然了。

下面是一个关于贫苦农民在中国城市艰难谋生的报道：

本文网址：<http://bbs3.news.163.com/board/rep.jsp?b=photo&i=106065>

报载，宁夏银川市的城管部门，要求每个在银川以擦皮鞋为生的人，统一购买由他们制作的“工作服”，否则不许营业，有的“违规者”竟然6次被城管执法人员砸掉摊子，光擦鞋用的椅子就没收了5把。（《新京报》2004年10月6日11版）这样做的原因，据说是为了便于管理和担心擦鞋者影响了市容。前几天哈尔滨也有类似的举措，城管部门为拣破烂的统一定做了“制服”，并规定每个从业者必须用高价租用他们定做的推车，否则就加以取缔。理由似乎同样是为了所谓的管理和市容。没错，我们中国人是好面子的，这一点外国人很早就觉察到了。我们被他们打败了被迫赔款，必须说是给予人家的“恩典”；被逼着成立外交部门，说成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连“办交涉”的时候，尽管又割地又赔款，但临了了却设计让占尽了便